

民國時期的報人情懷與 國家想像

• 李金銓

這篇文章是《報人報國》^① (待出版) 代序的刪節本。原代序討論七個問題，因篇幅所限而刪節為本文。《報人報國》是《文人論政》一書的續篇^②。本文準備探討民國報刊的三個問題：(1) 在「文人論政」的歷史脈絡下，「自由主義」如何獲得理解？(2) 自由報人的實踐與困境，即「報人報國」的「國家想像」如何落實或落空？(3) 「公共領域」在哪裏？

自從1905年廢除科舉以後，中國的知識階層逐漸邊緣化，傳統士大夫轉型為現代型的知識人，但他們「以天下為己任」的情懷始終沒有稍減，於是透過報刊、學會和大學干預政治^③。本文的「報人」是泛稱，而不限於特殊的職業角色。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，文士、學者、報人往往角色交叉混雜，並不像現代西方專業化的報刊那樣涇渭分明。梁啟超固然以言論啟迪民智，以胡適為首的知識群體、他的同輩論敵(陳獨秀、李大釗)乃至下一輩的儲安平，也都以發表政論為主。即連《申報》中期、《大公報》以及《世界日報》開始專業化的趨勢，加強新聞的採訪面，報人首先還是追求言論的「一言九鼎」，主筆的地位始終比記者高。

本文在題目中使用「國家想像」，倒不是要學某些時髦的「後現代主義者」特意強調國家的虛構面，而是用以考察報人到底「想像」有哪些方案、思想、辦法可以拯救一個貧窮落後、愚昧無知、內憂外患的文明古國。李歐梵的研究顯示，當時中國文人——從徐志摩到一般知識人——對於「現代化」的想像是相當現實的^④。這些救國方案從自由主義(包括杜威[John Dewey]／胡適的實踐主義[pragmatism，又譯實用主義])、無政府主義到社會主義(包括溫和的費邊社社會主義[Fabian Socialism]以及激進的共產主義)，不一而足。但中國思想界病急亂投醫，「主義」駁雜，「問題」混亂，各種勢力的滋長與鬥爭，更反映出報人的熱情與無奈。1930年代以後，有些文人進入政府體制，雖有報國情懷，卻未必有政治手腕；有的在政海傾軋中浮沉，喪失理想；更大多數文人論政而不參政，與權力中心若即若離，又在政治勢力的夾縫間單打獨鬥，最終怎能不頭破血流而以失敗收場^⑤？

1930年代以後，有些文人進入政府體制，雖有報國情懷，卻未必有政治手腕；有的在政海傾軋中浮沉，喪失理想；更大多數文人論政而不參政，與權力中心若即若離，又在政治勢力的夾縫間單打獨鬥，最終怎能不頭破血流而以失敗收場？

在1949年以前，中國近代報刊大致有三個範式：一是以《申報》為代表的商業報，二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兩方面的黨報，三是以《大公報》為代表的專業報。商業市場勃興是報紙專業化的原動力，這在美國報業發展史看得很清楚^⑥。《申報》和《大公報》的商業運作都相當成功，但《大公報》更受知識人尊敬。《大公報》自稱是文人論政、言論報國的工具，高薪養士，希望辦成《泰晤士報》(The Times)般的影響力；它維持儒家自由知識份子輕財重義的作風，認為言論獨立必須來自知識份子的良心，高懸「不黨、不賣、不私、不盲」的原則，是中國新聞界最高的專業和道德標竿。除此三類報刊外，還有許許多多風花雪月、有聞必錄的獵奇「小報」，為文人所不齒，但近年來有學者為它們「洗冤」，肯定它們的價值。當然，任何分類都不能絕對化而導致非白即黑，當時許多大報也以小報作風吸引讀者。

一 「自由主義」及其商榷

近現代中國報人最關注的問題，歷來是民族獨立和國家現代化，而以個人的權利與義務為次。民族與民主的辯證關係暫留不論。現在涉及的，是中國報刊對於自外引進的「自由」與「民主」兩個概念，語意混淆，歧義叢生。《報人報國》的作者之一桑兵發現，「自由」一詞從日文逐譯過來時，中國知識人未曾深究背後的來源，以致變成濫用詞，連「革命」和「專制」都可以用「自由」來包裝。同盟會的分支「自由黨」提出民生主義，便有社會主義的色彩。

民初政局混亂，黨派林立，報紙互相攻擊對方，完全沒有道德規範，表面上看似「自由」，其實任意妄為。當時言論自由沒有保障；自由的背後應該是責任，即使言論自由獲得制度的保障，也未必保證人們會有負責任的自由言論。王汎森提到，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，思想模糊、附會、飄忽不定，當時左右夾雜，不是黑白兩分，也不是互相排斥。毛澤東早年閱讀的書刊左右並存；蔣介石在五四時期也閱讀《新青年》、《新潮》，而且想遊學歐美；傅斯年曾在《新潮》介紹過俄國的社會革命；羅家倫唸北京大學時和李大釗過從甚密，主張俄國革命是最新的思想潮流，即將成為世界潮流^⑦。

在《報人報國》中，高力克曾以個案分析號稱自由主義者的「哥大四傑」：胡適、蔣廷黻、羅隆基、徐志摩。留美歸國學人也許相信自由主義的抽象理念，但總是懷疑它是否適合當時的中國。他們在個人自由與國家重建的矛盾中煎熬，左右搖擺，忽左忽右，最後各走各的陽關道。倒不是他們騎牆或沒有主見，而是任何思想的發展必然需要經過一個過程；何況各種主義一窩蜂湧入中國，思想界對這些新生事物來不及消化，沒有達成共識。胡適1926年訪俄，曾短暫讚賞其「空前的偉大政治新試驗」；雖然胡適反對以階級鬥爭為手段，但他自承是「新自由主義者」或「自由的社會主義者」。其實，1929年美國經濟大恐慌，儼然襯托出蘇俄是一個有效率的國家，西方知識界亦掀起一片崇俄的景象；中國有孫中山的聯俄政策，有胡適對俄國制度的正面評價，亦可見其一斑。

故此，桑兵評論道，民國時期所謂「自由知識份子」，其實立場分歧：有人根本不承認自己是「自由主義者」，對「自由主義」不以為然；有人開始不肯接受，

民初政局混亂，黨派林立，報紙互相攻擊對方，完全沒有道德規範，表面上看似「自由」，其實任意妄為。當時言論自由沒有保障；自由的背後應該是責任，即使言論自由獲得制度的保障，也未必保證人們會有負責任的自由言論。

後來隨着時勢變化才開始慢慢接受；有些甚至有條件接受獨裁專制。即連「胡適派」的成員，有的是無政府主義者，不完全是自由主義者。胡適創辦的《努力週報》和梁啟超的「研究系」有齟齬，但研究系和梁啟超自以為是自由主義者。丁文江屬於研究系，和胡適立場未必一致。羅隆基、聞一多和梁實秋原是「大江社」的國家主義者，後來梁實秋才轉入自由主義的陣營。至於抗戰後期西南聯大英美派學者左傾，他們是不是自由主義者？從「自我認定」和「後設」的概念來衡量，結果可能是大相逕庭的。

中國的「自由主義者」多半是書齋型精英。咄咄書生，空有理想，只能紙上談兵，既沒有組織力，也沒有行動力，在整個中國茫茫人海中不啻是孤島；不論從出身、教育背景還是關注的問題，他們和社會底層幾乎完全是脫節的。但他們左右受敵，布爾什維克者罵他們保守，保守派罵他們激進。縱然在整個知識群體中以胡適的「自由主義者」身份最硬朗，但他的自由主義思想也不是一蹴而成，而是經過不斷發展。前面提到，蘇維埃革命以後九年（1926年），胡適訪俄三天，對其體制大為讚美。胡適向來主張有幾分證據講幾分話，不講沒有證據的話，不講言過其實的話。然而遊俄短短三天，頂多得個浮光掠影、吉光片羽的印象，發表隨感或雜想則可，怎能對這麼重大的問題做出匆促的結論？如此輕率顯然不符合胡適嚴謹的個性，可見這次短暫旅行觀察不過給他一個機會印證平時的想法而已。前一年（1925年），徐志摩訪俄，卻獲得完全相反的結論，使他的「蘇俄夢」完全破滅。胡徐書生，爭論斯文；連同胡適後來與蔣廷黻等人為民主與新式獨裁的辯論，是不是應該看成自由主義牆內之爭？

胡適訪俄三天，對其體制大為讚美。徐志摩訪俄，卻使他的「蘇俄夢」完全破滅。胡徐書生，爭論斯文；連同胡適後來與蔣廷黻等人為民主與新式獨裁的辯論，是不是應該看成自由主義牆內之爭？

胡適對蘇俄的看法得自何處？他是受到美國進步主義 (Progressivism) 思潮的影響，更具體說，是受到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梅理安 (Charles E. Merriam) 教授的影響。美國於1929年遭遇前所未有的經濟大恐慌，「進步運動」 (Progressive Movement) 不斷抨擊的掠奪性資本主義弊端畢露無遺，蘇俄作為一面反照鏡，霎時間形象變得特別美好。進步運動的知識領袖集中在芝加哥大學，尤以哈普爾 (Samuel Harper)、舒曼 (Frederic L. Schuman) 和梅理安為核心。哈普爾和舒曼是美國領銜的蘇俄專家，梅理安創辦芝大政治系。他們對蘇俄革命充滿憧憬，竟致一味為蘇俄的制度護短：蘇俄實行農業集體化，付出重大人命的代價與犧牲，他們認為是值得的；斯大林發動大規模血腥整肅運動，他們認為鎮壓反革命是維護革命果實的必要手段，不怪斯大林的殘酷，只怪托洛斯基。1939年舒曼連同四百多人發表公開信，盛讚蘇俄教育體制進步，科學和經濟成就偉大，政治和種族政策開明。連蘇俄侵略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小國，他們也振振有詞，為之辯護。他們批判美國資本主義的弊病，先鼓吹美國應該學習蘇俄社會的經濟平等，後來看不到蘇俄制度的殘酷，甚至成為斯大林的激進辯護士^⑥。西方知識人跟着蘇聯的宣傳鸚鵡學舌，斯大林為他們取了一個頗為捉狹的名字：「有用的白癡」 (useful idiot)。

梅理安說蘇俄以摧殘「反革命行為」保障空前的政治試驗，胡適認為「此論甚公允」。胡適從來不太激進，對蘇俄的崇敬是平生少有的例外，也只是曇花一現。進步運動與杜威的實踐主義都是從自由主義所派生的，它們之間有千絲萬縷的關係，而胡適又是杜威在華最重要的門生。這個問題牽涉太廣，這裏無法展開細緻的討論，只能約略涉及進步主義對美國新聞界和對胡適的影響。

進步運動是刷新美國政治、經濟和文化的重要標誌。它維護了中產專業階層的興起；新型記者出現，以改革者的身份不斷在雜誌上揭發政客貪腐，攻擊財閥壟斷，形成美國新聞史上最具有特色的「扒糞運動」(muckraking) ⑩。媒介社會學家甘斯 (Herbert J. Gans) 指出，美國媒介專業意理 (media professionalism) 背後蘊藏了一組「恆久價值」(enduring values)，包括種族中心主義、利他性民主、負責任資本主義、個人主義、不走極端、嚮往小城生活方式等等，凡此皆是進步主義的產物⑪。新聞專業追求平衡客觀，不偏不倚，事實與意見剝離，但操作起來絕非抽象無根，更不是漫無邊際；除非深植於若干基本假設之上，否則必無着落。這些基本假設是一套習以為常、習焉不察、視為當然的「恆久價值」。倘若社會缺乏基本共識，恆久價值不斷受到挑戰，相信新聞專業意理是無從落實的。此乃一針見血之論。

有趣的是，進步運動領袖寫文章，多刊登在李普曼 (Walter Lippmann) 於1913年所創立的《新共和》(New Republic)。胡適留美期間最醉心於《新共和》，回國以後更積極仿效它的風格辦同人雜誌，積極對國事發表各種主張。他在《努力週報》宣傳「好政府主義」，不就是進步運動的中國版？話說杜威思想主導「胡適派」的自由主義，特別在哲學、科學方法和教育方面，但杜威對中國報刊的發展沒有明顯的影響。杜威不以報刊實踐聞名，他反對精英主義，但「大眾民主」在封閉而分裂的中國根本是空中樓閣，毫無實現的機會。胡適辦刊物，還得結合英美派的知識精英，其精神與路線顯然受到杜威論爭對手李普曼的啟發。

除了美國進步運動的知識領袖，英國哲學家羅素 (Bertrand Russell) 親睹蘇俄革命的變化，也刻畫出自由主義者左右搖擺的窘境。1917年蘇維埃革命成功，三年後羅素即實地往訪考察。他原在紐約的《解放者》(Liberator) 雜誌撰文贊成這個革命，但身歷其境以後卻改變初衷。羅素說，共產主義的理想太好了，好到簡直可以不擇手段，以致殘暴統治，剝奪自由，在所不惜；宣傳如宗教狂熱，人民生活卻貧困不堪，經濟陷入嚴重危機⑫。羅素接着於1920年秋從蘇俄訪華一年，發表一系列哲學演講，警告中國必須謹防帝國主義的干預。他先是主張中國應該採取溫和的基爾特社會主義 (Guild Socialism)，不料數月後在告別演說轉了個大彎，建議中國應該實行俄式國家社會主義，才能振興實業和教育，等到實業和教育發展到英美的程度，再來剷除資本的流毒，別無他途⑬。

杜威對中國報刊的發展沒有明顯的影響。杜威不以報刊實踐聞名，他反對精英主義，但「大眾民主」在封閉而分裂的中國根本是空中樓閣，毫無實現的機會。胡適辦刊物，還得結合英美派的知識精英，其精神與路線顯然受到杜威論爭對手李普曼的啟發。

二 自由報人的實踐與困境

(一) 胡適與《努力週報》

五四運動以後，中共誕生，國民黨改組，軍閥跟官僚政客爭權奪利，報紙黨同伐異；南北對立，日趨緊張；戰亂頻仍，政治無望，自由主義極難生存。胡適於1917年回國，宣布二十年不談政治，但在中國你不碰政治，政治會來惹你。他只好破戒，於1922年5月創辦《努力週報》，為時僅一年六個月。胡適宣布要做一個負責任的輿論家，只問是非，不論黨派，「干預政治和主持正誼的責任必定落在知識階級的肩膊上」。

面對軍閥和政府壓迫報紙，報紙黨同伐異，陳冷穩妥把舵，《申報》注重揭發社會陰暗面。陳冷提出報紙是「公器」。公器所服務的是政府與人民、國家與民族，既不徇黨派之私，但也不是西方意義的「報導真相」。

在《報人報國》中，潘光哲認為，胡適創辦《努力週報》，折射出自由主義在中國如何遭受左右夾攻。胡適在美國求學就有開風氣之志，深受《新共和》的影響。胡適論政，不願捲入實際政治的漩渦，他要做中間人、公正人、評判員、監督者。他認為主義不能包醫百病，不能根本解決問題，因而提倡一點一滴的溫和漸進改良。他提倡的「好政府」，消極上防止營私舞弊、貪官污吏，積極上替社會全體謀充分的福利，容納個人的自由。這是個立憲的政府、公開的政府、有計劃的政府。胡適的「好政府」脫胎於進步運動。他呼籲「多談些問題，少談些主義」，顯然也源自實踐主義。胡適提出「公」的理想——講公道話，做公正人。這種「低調民主」碰到「高調革命」，自然就窘態畢露了。右派有邵力子的《民國日報》攻擊他，左派有張國燾的中共機關報《先驅》攻擊他，張申府、周恩來也在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的機關刊物《少年》批評胡適妥協。當時還有別人（如成舍我、陳冷）鼓吹說「公道話」，與胡適所見略同。政治激情，導致言論爭鋒，反映當時政治界和思想界的現實，本來是應有之義，然當社會共識薄弱時，不知道說「公道話」的基礎和標準何在？

（二）陳冷與《申報》

上海舊公共租界望平街，僅一百米的窄街，卻聚集了《申報》、《新聞報》、《時報》、《時事新報》四報，是民國時期的報業重鎮、全國輿論的中心、報人的避難所。《申報》起於1872年，終於1949年，歷時七十八年。晚清《申報》初創時，社會上普遍鄙視報紙，認為是江浙落拓文人的歸宿與末路，他們生活苦，名譽低，「幾與沿門求乞無異矣」^⑩。

《申報》有過十個主筆。陳冷（景韓）是第七任主筆，從1912到1930年，歷十八年，此時報業開始向職業化轉型，記者群體意識日益成熟。陳冷是前清秀才，同情革命黨，自日本歸國以後，1906年開始在《時報》寫短評。胡適從徽州到上海求學，也是他的讀者。1912年為史量才延攬，出任《申報》主筆，仍是《時報》顧問。陳冷於1918年在《申報》的〈自由談〉副刊開闢了一個「自由談之自由談」專欄，筆名叫做「不冷」，每天寫一篇「報屁股」短評。1920年由周瘦鵲接棒。陳冷在《申報》寫了六千多篇時評。在《文人論政》中，陳建華曾指出，這些嬉怒笑罵的「報屁股」文章，切中時弊，筆鋒犀利，用幽默迴避政治箝制，又在許多社會議題上開拓了言論自由的空間，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^⑪。

面對軍閥和政府壓迫報紙，報紙黨同伐異，陳冷穩妥把舵，《申報》注重揭發社會陰暗面。他強調自由獨立，但不是理論的詮釋，而是長期在報館每天低調跟議題打交道。他提出新聞必須「確、速、博」，略近於先前梁啟超的看法。外勤要多跑，要客觀，不加己意，反對流水賬和起居注式報導。陳冷提出報紙是「公器」。公器者，何也？戈公振說「上足以監督政府，下足以指導人民」，趙君豪說應秉「國家至上、民族至上」之精神。準此，公器所服務的是政府與人民、國家與民族，既不徇黨派之私，但也不是西方意義的「報導真相」。

陳冷鼓吹立憲，支持地方自治，批評專制政治。他是留日學生，應該受到日本報紙以及從西方轉介的自由思想所影響，其表現於日常報業的實踐，當然和舊派士大夫不同。但他畢竟是個實踐者，不是理論家，對「公器」的闡釋失之

於簡，尚不成體系，不知與西方報業的專業意理有何異同？陳冷為人低調，與蔣介石私交甚篤，卻婉拒蔣的邀請任其重要幕僚，與董顯光等人為「大勢所趨」不同。他的風骨嶙峋體現了自由報人的風範。

(三) 成舍我與「世界報系」

第一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之際，中國知識階層紛紛拋棄弱肉強食的社會進化論，轉而嚮往互助主義和無政府主義。成舍我的思想淵源來自無政府主義的「新世紀派」（以張靜江、李石曾、吳稚暉為領袖）^⑤。當時國人一方面反傳統，一方面囫圇吞棗地接受各種駁雜的西方思潮，只有模模糊糊的片面理解。唐海江在《報人報國》中指出，成舍我畢竟以儒家之理，「格」無政府主義之義，以為世界主義就是大同主義。他創辦的報系和新聞學校均以「世界」為名，可見他對世界主義有多推崇。國難迫在眉睫，他主張先要有民族主義，才能進到世界大同。世界主義因而暗合民族主義，這個立場與孫中山如出一轍。成舍我主張以無政府主義的人道和互助實現理想，不贊成共產黨的階級鬥爭。抗戰時期他和《大公報》都不反對統制新聞，但鼓吹政府借鑒歐戰時期的英國經驗與新聞界合作。

成舍我報人生涯三十年，坐牢不下二十次，報紙封門十幾次。他創辦北平《世界晚報》，創刊號即公布四條宗旨：言論公正，不畏強暴，不收津貼，消息靈確。他一輩子捋各方權勢的虎鬚，充分表現了「威武不能屈」的精神。成舍我在《世界日報》攻擊軍閥段祺瑞、張宗昌、閻錫山，差點被張宗昌砍頭。在南京《民生報》揭發彭學沛貪污，得罪行政院長汪精衛，最後被汪勒令永遠停刊。成舍我不支持共產黨的暴力革命和階級鬥爭，1948年底《世界日報》被查封，改為《光明日報》^⑥。他是五四時代的人，但任憑如何反對儒家傳統，也澆不熄知識人「以天下為己任」的熱情，言論報國——特別是「威武不能屈」的精神——何嘗不是孟子式的擔當？

成舍我要開創中國報業的托拉斯 (trust)，但他又想將資本主義大眾化。他先後創辦北平《世界晚報》(1924) 和《世界日報》(1925)、南京《民生報》(1927)、上海《立報》(1935)。1945年抗戰結束，他接收上海《立報》，恢復被日本人沒收的北平《世界日報》和《世界晚報》，還希望復刊南京《民生報》。1948年與陳夫立商議成立中國新聞公司，在各地成立分社，變成名副其實的托拉斯，然壯志未酬。他提倡資本家出錢，專家辦報，老百姓講話。主張由國家立法，設立董事會，規定資本家延聘編委會成員三分之一，餘皆由學術機構、法定民眾團體和讀者代表擔任，董事會決定主編任免和言論方針，資方無權干涉。他希望辦平民報紙，人人看得起，以對抗資本家的操縱^⑦。要資本家出錢，又不要他們干預，這個絕無僅有的理想如果成功，很難想像會是何等光景。

以報紙教育大眾，必須力求通俗。成舍我批評中國的報紙太貴，文字太深，與多數國民無關痛癢。他認為報紙必須為多數人民說話，因而反對報紙中立。他說：「〔英國報紙〕初不似吾國報紙，一方面環境壓迫，不能為自由之表白；一方面報紙自身，亦樂以模稜游移之說，博『中立』、『不黨』之美名。」^⑧然則他要站在國民立場，正視事實，以自由思想做自由判斷，而無任何黨派私怨。如此又何異於《大公報》的「不黨」原則？1920年代，《努力週報》以少數知識

成舍我批評中國的報紙太貴，文字太深，與多數國民無關痛癢。他認為報紙必須為多數人民說話，因而反對報紙中立。他要站在國民立場，正視事實，以自由思想做自由判斷，而無任何黨派私怨。

精英為對象，《大公報》的讀者包括政界、商界和知識界精英，陳獨秀和李大釗正在組織群眾革命，而成舍我卻致力於平民報紙。成舍我代表的是甚麼社群？他和平民教育運動有沒有互相影響？他是否以知識精英的身份揣想平民要說甚麼話？這些問題尚待追蹤釐清。

(四) 王芸生與《大公報》

《大公報》最受知識人和政治領袖(包括蔣介石和毛澤東)所推重。在《報人報國》中，楊奎松運用繡花細針的手法，組織豐富的第一手材料，刻畫《大公報》主筆王芸生在政權變化前後的心理變化，栩栩如生，令人讀了彷彿身歷其境。王芸生目睹國民黨大勢已去，擔心共產黨不要他這種人。不料在策反以後，經過思想改造，他很快就跟上時代，對自己和對《大公報》都是上綱上線，既自譴，又自賤，以至於聲稱他是來「投降」的。他罵《大公報》維持着一種改良主義者的面貌，「基本屬性是反動的，實際上給反動的統治階級起了掩護作用」。他罵自己是形式主義和存有客卿思想、個人主義和本位主義、資產階級辦報的思想以及官僚主義的領導作風，總結起來思想根源是「個人主義、自由主義的好名思想」。不止他，很多「民主人士」(如徐鑄成、蕭乾、儲安平)也都經歷這種變化，難道這是普遍現象？他們「認錯」是不是就意味着「投降」？晚年情勢許可，他們紛紛後悔當年的違心之論，又當何解？

《大公報》主筆王芸生與蔣介石若即若離，時常受到《中央日報》和新華社兩邊嚴厲抨擊。王的言論到底是代表自由主義，還是出於他自己說的功利思想？他在1949年以後思想言論轉向如此迅速，除了時勢所逼外，是否代表了自由主義者的必然歸宿？

《大公報》改造以前，是不是遊走於國共之間的「第三條道路」？自從中共華東局代宣傳部長惲逸群在1948年說《大公報》對國民黨「小罵大幫忙」，長期以來儼然已成定論。近年來開始有翻案文章，其中方漢奇說《大公報》對國民黨不光是「小罵」，也有「大罵」，甚至「怒罵」和「痛罵」。他說《大公報》罵國民黨比罵共產黨更多、更經常；《大公報》為中共爭取了中間讀者的支持，「更多的是幫了共產黨，而不是幫了國民黨」^⑩。

我們且從人脈、立場和影響三方面來探討。一、從人脈來看，在抗戰以前《大公報》社論批評當局頗為嚴厲，抗戰以後國難當前，張季鸞躍身變成「國之諍友」，與蔣介石和陳布雷私交甚篤。張去世以後，胡政之和蔣走得不近，王芸生與蔣若即若離，時常受到《中央日報》和新華社兩邊嚴厲抨擊。王的言論到底是代表自由主義，還是出於他自己說的功利思想？他在1949年以後思想言論轉向如此迅速，除了時勢所逼，不得不然，是否代表了自由主義者的必然歸宿？

二、以立場而言，王芸生在國共內戰時期提出「政治民主化，軍隊國家化」，似乎不是標新立異，成舍我的報系亦持此論，這是美國人的立場，也是當時主流輿論。這個論調算不算「第三條道路」？

三、從影響來說，如前所述，惲逸群批評《大公報》對國民黨是「小罵大幫忙」，是幫閒和幫兇，但方漢奇翻案說它替共產黨爭取了很多中間讀者。我們知道，由於《大公報》標榜「不黨」，只要發現員工是國民黨黨員立即開除。國民黨在明處，共產黨地下黨員在暗處，最後當楊剛和李純青策反王芸生向中共靠攏時，發現報社內有很多共產黨的地下黨員。抗戰勝利後不出幾年，情勢逆轉，對國民黨不利，《大公報》在輿論上是否起到摧枯拉朽的作用？

三 「公共領域」在哪裏？

自從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領袖哈貝馬斯 (Jürgen Habermas) 提出「公共領域」(public sphere) 的宏大理論，並譯介到英語和中文世界以後，一般學者趨之若鶩，紛紛援引為統攝性的敘述或分析概念。海德堡大學的瓦格納 (Rudolph G. Wagner) 及其同事研究晚清上海報業，即是個中著例。筆者覺得他們太削足適履，理論先行，強把歷史材料塞進哈貝馬斯「公共領域」的宏大理論緊箍咒^②。

往日是否真的有過一個美好的「公共領域」呢？美國學者舒德森 (Michael Schudson) 以研究新聞的社會史聞名，他頗懷疑歷史上有過那麼浪漫的「流金歲月」(good old days)，他反對哈貝馬斯過於強調商業的副作用，以為報紙的商業化未必腐蝕公共空間。但他認為「公共領域」這個概念並非一無是處。它至少有兩個主要的作用，一是提供規範性的指標，引導我們反思甚麼才是理想的社會；二是刺激我們想像一群深刻的問題，以分析過去和現在的政治生活^③。

英國傳播學者科倫 (James Curran) 就是以「公共領域」為規範性的綱領，建構「社會民主」的媒介藍圖，以抗衡美國式「自由民主」的模式。他的藍圖由一個同心圓組成，核心圈是公共服務電視，輻射並貫注到第二圈的四個領域，分別是專業傳播者領域，市民社會裏政黨、社會運動、壓力團體的傳播活動，私營領域，以及「社會市場」(social market) 領域 (即由國家支持但市場經營的少數媒介)^④。儘管各行專業學者以種種理由批評哈貝馬斯，但這些批評都是無關宏旨的，因為科倫要的是哈氏的理想原型，而不涉及哈氏的分析是否站得住腳。

《報人報國》一書多位作者的取徑迥異於科倫。許紀霖分析近代中國報刊對於「個人主義」的傳播，章清追溯中國輿論的形成，唐小兵考察清末民初的報刊，都是以「公共領域」為史學探討的起點，而不是歸宿點。他們從「公共領域」的概念出發，激發一些有意義的問題，但答案卻是開放的，並未預設中國社會有無出現過「公共領域」，而主要是回到歷史經驗研究中解答，有則有之，無則無之。他們關心的是：中國傳統「清議」和現代「公共領域」有何關係？當時社會缺乏共識，黨同伐異，中產階級薄弱，市民社會尚未形成，報刊如何促進或形成「公共領域」？

「公共領域」是“public sphere”的中譯，然則“public”這個字究作何解？首先，在英文和法文裏面，此字略同於中文「公共」的意思，反面就是「私人」。「公共意見」(或「公共輿論」) 反映社區內的多元利益和多元觀點，媒介促進上情下達，下情上達，但不僅要上下溝通，更要有平等的平行溝通，總之就是民主的理性溝通，求同存異。在這個「公共」的語義底下繼續深究，在美國的語境裏，「公共領域」、「公共輿論」的論述出現兩派重要的典型：李普曼認為公共事務太複雜，新聞掛一漏萬，必須由專家精英作為媒介與公眾的中介，那是一個類似代議政治的「低調民主」；而實踐主義巨擘杜威則提倡透過草根大眾直接參與，進行社區全面理性溝通，這是一個「高調民主」，這兩個民主原型成為日後許多學術辯論的原型^⑤。

再說，“public opinion”在英文裏另有蹊蹺，原來“opinion”和“opinionated”出自同源，“opinionated (man)”是指「充滿偏見(之人)」，而集合眾人的「偏見」

《報人報國》一書多位作者都是以「公共領域」為史學探討的起點，而不是歸宿點。他們關心的是：中國傳統「清議」和現代「公共領域」有何關係？當時社會缺乏共識，黨同伐異，中產階級薄弱，市民社會尚未形成，報刊如何促進或形成「公共領域」？

儼然變成理性和智慧的「公共輿論」^②，因此「公眾」如何過渡到「公共」？設若“public”是理性的，“mass”則被賦予「烏合之眾」的涵義^③，然則“mass media”與“public opinion”的關係何在？自由主義（如芝加哥學派）大抵肯定大眾媒介促進公共輿論的形成，而激進派（如法蘭克福學派）則批判「非理性」的大眾媒介受到政治和商業的污染，反而蒙蔽公共輿論的清明。

其次，迥異於英文和法文「公共」的意思，“public”在德文等於中文的「公開」，反面就是「隱秘」。例如德國傳播學者諾里—紐曼（Elisabeth Noelle-Neumann）提出「沉默的螺旋」（spiral of silence）的說法，指每個人都有個心理機制，不願意被人孤立，所以不斷在盤算、評估哪些屬於主流意見；為了怕被孤立，不敢拂逆多數意見的「公開」壓力，因而人們支持主流意見，如果許多人這樣做，多數意見自然會像螺旋向上般愈捲愈大，逐漸佔領支配的地位，相反的則是少數意見像螺旋向下般逐漸萎縮，趨於沉寂甚至消失^④。

哈貝馬斯是德國人，但他的“public sphere”建構了免於政治壓制、免於商業異化的場域，一方面批評惡質資本主義，一方面抨擊專制列寧主義，追求的是烏托邦的境界，使人們能夠充分溝通，互相爭鳴，使理性更澄明，這毋寧更接近英文「公共」的意思。在中文此又作何解？《禮運大同篇》提到「天下為公」，以及所謂的「大公無私」，顯係指上面「公共」的第一義；而報刊是社會「公器」這種說法，既有形成「公共」輿論、反映民間聲音的第一義，又有監督政府，給政府施加民意「公開」壓力的第二義，兩義兼備，至於報刊有沒有達成理想境界則是另外一回事。

關於中國近代報刊和「公共領域」，筆者想綜合討論幾個問題：第一，傳統儒士「清議」是不是近代西歐社會的「公共領域」？傳統的清議包括奏摺、書信和廷議，以儒家義理臧否人物，批評政事。但是儒家的義理，在朝廷崩潰以後，根本無法應付李鴻章所說的「三千年未有之變局」，更不能適應現代社會所必備的知識。梁啟超是新舊時代交替的人物，他受到由日本明治維新所轉介的西方思想所影響，引進西學到中國，但常常不惜「以今日之我戰昨日之我」，互相矛盾，可見當時知識界思潮之混亂。清議在士大夫系統內有道德淨化的功能，可能會批評到同僚，而被批評者莫不引以為恥，以致曾國藩有「一沾清議，終身不齒」之嘆^⑤。儘管如此，清議在本質上還是朝廷時代下對上的諫諍，「公共領域」理論上是民主社會的平等對話，無論基本精神或權力關係都與清議截然異趣，從清議轉化為「公共領域」需要哪些條件？

第二，「公共領域」假設以家庭的私領域為堡壘，培養非功利的自由心靈和有理性的個體，當個人走出家庭，進入國家與社會的緩衝地帶，一群陌生人必須理性溝通。近代中國家庭制度不斷解體，五四時期知識份子攻擊舊家庭制度不遺餘力，巴金的小說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正是最鮮明的寫照。私領域的家庭疏離如此，公領域也沒有類似近代歐洲沙龍和咖啡館論理的空間（以中國的茶館、戲院、公園附會之，是耶，非耶？），「公共領域」的着落在何處？原來中國的「民間社會」類似於這個「緩衝地帶」，由鄉紳擔任朝廷和民間社會的紐帶，但始終沒有建立現代意義的「市民社會」（上海頂多是「小市民社會」）。後來社會環境變化，鄉紳地位式微，新式學會、社團逐漸興起，中產階級固然逐漸形

報刊是社會「公器」這種說法，既有形成「公共」輿論、反映民間聲音的第一義，又有監督政府，給政府施加民意「公開」壓力的第二義，至於報刊有沒有達成哈貝馬斯「公共領域」的理想境界則是另外一回事。

成，白話文應運普及，整個社會意識跟着提高。但中國的識字率太低（羅素訪華時，認為教育和實業是中國的當務之急），報刊流傳是點的，不是面的，頂多限於都會知識群；即使《申報》的滲透力大於《大公報》，也未滲透到社會底層。報人和知識人各說各話，沒有形成一個波瀾壯闊的局面，後來「黨化」的局面更為不堪。

報人和報刊到底有多少影響力？既然「公共領域」是理性溝通的場域，除了文本 (text) 分析外，尚須旁敲側擊，把文本放置到歷史語境 (context) 之中去理解，並且聯繫到當時的政治、經濟和文化脈絡，了解當時報業結構、內容和受眾。一旦脫離歷史語境，文本分析容易切割得支離破碎，或斷章取義，或過度解讀，以致無法還原整體的圖景，抓不住歷史的趨向。有甚麼證據讓我們看到「公共領域」的運作：受眾如何解讀報刊文本？不同社會階層如何圍繞公共議題展開生動的溝通、對話和辯駁？在這個場域中報刊是調節者、仲裁者，或是議題設定者？是眾聲喧囂，還是化對話為公共行動？

第三，理性溝通的基礎在哪裏？近代中國報紙黨同伐異，成為政黨控制的工具，思想混亂，不夠專業化。清末民初的《申報》只有訪員，沒有記者，只是落拓文人的歸宿，內容以奏摺、官方文書、各省瑣錄、詩詞和廣告（商家市價、輪船航期，戲館劇碼）為主，沒有太多新聞。1920、30年代的報刊，有類似張季鸞在《大公報》、胡適在《獨立評論》、陳冷在《申報》以及成舍我在《世界日報》等等的努力，是不是象徵近代中國已有「公共領域」的雛形？陳冷主持《申報》筆政，先後和周瘦鵑在《申報·自由談》用冷嘲熱諷的筆調諷刺時局，應該如何評價？陳建華認為，他們嬉怒笑罵，從事邊緣戰鬥，顛覆宰制的權威、傳統與成規，爭取自由；但桑兵等人感嘆，靠「鴛鴦蝴蝶派」爭取自由，不亦悲乎。前有袁世凱壓制新聞自由，接着軍閥混戰，後有國民黨在統一全國以後，也開始承襲蘇聯或法西斯理論，黨義和輿論合而為一。悲乎，報刊必須躲在租界才能講話，理性溝通的基礎到底在哪裏？

第四，現代知識份子在邊緣化以後，重新進入政治中心，進入官場的放棄批判政權的角色，未進官場的跟政治若即若離，論政而不參政，沒有組織力量，政治上幾無着落點。大學教授辦同人報刊，都是教書以外的副業，自己捐錢捐時間，而刊物本身沒有獨立的經濟基礎。讀者圈極小，知識群體與底層脫節，他們表達「公共」意見，只能憑「良知」，此外還靠甚麼？丁文江在燕京大學演講，鼓吹「少數人的責任」，即是靠知識、教育和經驗孕育出來的理性和政治成熟。這是精英主義，不是市民政治。胡適想成為「監督政黨的政治家」，立場是「超然的，獨立的」，「只認社會國家，不分黨派。只有政見，沒有黨見」。儲安平創辦的《觀察》聲稱代表一般知識份子為善良的廣大人民說話。這種「超然」、「公正」以甚麼為立足點？《大公報》「不黨」，超越狹隘的黨派利益，但是超越黨派是不是就代表公共意見呢？《大公報》揭櫫「不黨、不賣、不私、不盲」，在理念上是中國報人專業意理最成熟的表現。如果將它當成一面反面鏡，可能正是當時的報紙充斥着「黨、賣、私、盲」，《大公報》希望匡正時弊。可惜《大公報》長出的萌芽，因為時局變化和缺乏社會基礎，致使新聞專業意理沒有茁壯的機會。

中國的識字率太低，報刊流傳是點的，不是面的，頂多限於都會知識群；即使《申報》的滲透力大於《大公報》，也未滲透到社會底層。報人和知識人各說各話，沒有形成一個波瀾壯闊的局面，後來「黨化」的局面更為不堪。

四 結語

風聲雨聲，國事天下事，中國知識群體事事關心。但他們的國家想像往往與現實政治有許多衝突。西方社會當然有「指點江山」的精英報刊，但主流畢竟還是專業報刊，其動機未必是精英自覺的報國情懷，而中國近現代報刊的主流卻是「文人論政」的報國情懷。「文人論政」是中國報業的基本特色之一，是非優劣，都不同於西方的專業報刊。近代中國知識群體在邊緣化的過程中，以進入報刊的方式重構社會與文化的重心。《文人論政》和《報人報國》這兩本書的旨趣在於從學術對話中廓清歷史脈絡，多方面考察「文人論政」過去的成就和內在限制。「文人論政」的前景可否預卜？以政治情況和經濟基礎來說，筆者想，它可能是媒介史進程上的一個驛站，不可能長駐不前，這個題目需要專文探討。但不論「文人論政」的前途如何，中國知識人報國的情懷必然長存，也許必須以別的媒介形式表達出來而已。

新聞史的研究不能抱殘守缺，必須從人文和社會科學學科吸取理論和方法的資源，同時從新聞史迴向給人文與社會科學，保持一個開放互動的態度。「報人情懷」與「國家想像」還沒有到下定論的時候。即使下了暫時的結論，也是權宜性質的，一旦有了嶄新的材料和觀點，跟着不同時代感的呼喚，歷史的意義自然也有所不同。哲學是甚麼？一位學哲學的朋友告訴我，哲學就是「沒有一拳可以擊倒對方的論述 (no knockout statement)，因此對話才可以不斷繼續下去」。旨哉斯言。歷史真相更加曲折、複雜而矛盾，不可能「一語定乾坤」，唯有多視角多維度探索，切磋琢磨，才能慢慢地還原歷史場景，逼近歷史「真相」，配合時代的呼喚，以獲致更真切而有意義的了解。

中國近現代報刊的主流是「文人論政」的報國情懷。是非優劣，都不同於西方的專業報刊。近代中國知識群體在邊緣化的過程中，以進入報刊的方式重構社會與文化的重心。不論「文人論政」的前途如何，中國知識人報國的情懷必然長存。

註釋

① 以下引文如無特別註明，均出自此書的作者。

② 李金銓主編：《文人論政：知識份子與報刊》（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8）；李金銓編著：《文人論政：民國知識份子與報刊》（台北：政大出版社，2008）。下引頁數悉以簡體版為準。

③ 余英時：〈中國知識份子的邊緣化〉，載《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》（台北：三民書局，1992），頁33-50。

④ Leo Ou-fan Lee, "In Search of Modernity: Some Reflections on a New Mode of Consciousness in Twentieth-Century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", in *Ideas across Cultures: Essays on Chinese Thought in Honor of Benjamin I. Schwartz*, ed. Paul A. Cohen and Merle Goldman (Cambridge, MA: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, Harvard University, 1990), 109-35.

⑤ 李金銓：〈序言〉，載《文人論政》，頁3-8。

⑥ Michael Schudson, *Discovering the News: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* (New York: Basic Books, 1978).

⑦ 王汎森：〈五四運動與生活世界的變化〉，《二十一世紀》（香港中文大學·中國文化研究所），2009年6月號，頁44-54。

⑧ Ido Oren, *Our Enemies and Us: America's Rivalries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Science* (Ithaca, NY: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, 2002), 111-16.

- ⑨ James W. Carey, "The Press, Public Opinion, and Public Discourse: On the Edge of the Postmodern", in *James Carey: A Critical Reader*, ed. Eve S. Munson and Catherine A. Warren (Minneapolis, MN: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, 1997), 242-43.
- ⑩ Herbert J. Gans, *Deciding What's News: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, NBC Nightly News, Newsweek, and Time* (New York: Pantheon Books, 1979), 42-52.
- ⑪ Bertrand Russell, *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Bolshevism* (Ithaca, NY: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Digital Collection, 1920).
- ⑫ 袁剛、孫家祥、任丙強編：《中國到自由之路：羅素在華講演集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4），頁303-304；Bertrand Russell, *The Problem of China* (Nottingham: Spokesman, 1993)。按：杜威也在此前後訪華。
- ⑬⑭ 張功臣：《民國報人：新聞史上的隱秘一頁》（濟南：山東畫報出版社，2010），頁304；45-101。
- ⑮ 陳建華：〈共和憲政與家國想像：周瘦鵑與《申報·自由談》，1921-1926〉，載《文人論政》，頁186-209。
- ⑯⑰ 成露茜、唐志宏、李明哲：〈無政府主義的影響與實踐：成舍我的「非資本主義大眾化報刊」〉，《新聞學研究》，2011年第106期，頁219-48。
- ⑱ 成舍我：〈在倫敦所見：英國報業之新活動（續）〉，《民生報》，1930年11月21日，頁3。
- ⑲ 方漢奇：〈前言：再論大公報的歷史地位〉，載方漢奇等：《大公報百年史，1902-06-17—2002-06-17》（北京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2004），頁1-23。
- ⑳ Rudolph G. Wagner, ed., *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: Word, Image, and City in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, 1870-1910* (Albany, NY: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, 2007)。評論見李金銓：〈過度闡釋公共領域〉，《二十一世紀》，2008年12月號，頁122-24。
- ㉑ Michael Schudson, *The Power of News* (Cambridge, MA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95), 189-203.
- ㉒ James Curran, "Media and Democracy", in *Mass Media and Society*, 4th ed., ed. James Curran and Michael Gurevitch (London: Hodder Arnold, 2005), 138-45。他心目中的公共服務電視（即藍圖的核心）是「有代表性的多元主義」（representative pluralism），略同於德國和北歐民主統合主義的模式（democratic corporatist model）。但他一筆帶過，語焉不詳。關於這個模式的分析，參見Daniel C. Hallin and Paolo Mancini, *Comparing Media Systems: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* (New York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2004), 143-97。
- ㉓ 詳參Walter Lippmann, *Public Opinion* (New York: Harcourt, Brace and Company, 1922); John Dewey, *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* (New York: H. Holt and Company, 1927)。他們的辯論見James W. Carey, *Communication as Culture* (Boston: Unwin Hyman, 1989), 69-88。卡瑞（James W. Carey）同情杜威，駁斥李普曼。舒德森則駁斥卡瑞對李普曼的批評，聲稱對話不是民主的靈魂，參見Michael Schudson, *The Power of News*, 204-23。
- ㉔ Daniel J. Boorstin, *The Republic of Technology: Reflections on Our Future Community* (New York: Harper and Row, 1978)。
- ㉕ 參見Herbert Blumer, "The Mass, the Public, and Public Opinion", in *New Outline of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*, ed. Alfred McClung Lee (New York: Barnes and Noble, 1946), 185-93。
- ㉖ Elisabeth Noelle-Neumann, *The Spiral of Silence: Public Opinion, Our Social Skin* (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93)。
- ㉗ 楊國強：〈晚清的清流與名士〉，《史林》，2006年第4期，www.chinese-thought.org/shgc/002015.htm。